

陇上学人文存

吴小美 卷

吴小美 著 魏韶华 编选

甘肃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陇上学人文存·吴小美卷 / 范鹏总主编；吴小美著；
魏韶华编选. —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15.5

ISBN 978-7-226-04780-4

I . ①陇… II . ①范… ②吴… ③魏… III . ①社会科学—文集 ②中国文学—文学史研究—文集 IV . ①C53
②I209—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 第 108295 号

出版人：吉西平

责任编辑：肖林霞

封面设计：王林强

陇上学人文存·吴小美卷

范鹏 总主编

吴小美 著 魏韶华 编选

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730030 兰州市读者大道 568 号)

天水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90 毫米 × 1240 毫米 1/32 印张 11.625 插页 7 字数 291 千

2015 年 7 月第 1 版 201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 册

ISBN 978-7-226-04780-4 定价：60.00 元

(图书若有破损、缺页可随时与印厂联系)



《陇上学人文存》第一辑

编辑委员会

名誉主任：陆 浩 刘伟平
主任：励小捷 咸 辉
副主任：张建昌 张瑞民 范 鹏
委员：张余胜 吉西平 魏胜文 高志凌
张 炯 安文华 马廷旭

学术指导委员会

王希隆 王肃元 王洲塔 王晓兴 王嘉毅
傅德印 伏俊琏 李朝东 陈晓龙 张先堂
郝树声 贾东海 高新才 董汉河 程金城

总主编：范 鹏
副总主编：魏胜文 马廷旭

《陇上学人文存》第二辑

编辑委员会

名誉主任：王三运 刘伟平
主任：连辑 咸辉
副主任：张建昌 张瑞民 范鹏
委员：张余胜 吉西平 魏胜文 高志凌
张炯 安文华 马廷旭

学术指导委员会

王希隆 王肃元 王洲塔 王晓兴 王嘉毅
傅德印 伏俊琏 李朝东 陈晓龙 张先堂
郝树声 贾东海 高新才 董汉河 程金城

总主编：范鹏
副总主编：魏胜文 马廷旭

《陇上学人文存》第三辑

编辑委员会

名誉主任：	王三运	刘伟平
主任：	连辑	张广智
副主任：	张建昌	范鹏 马成洋
委员：	管钰年	吉西平 王福生 陈双梅
	朱智文	安文华 刘进军 马廷旭
	张亚杰	李树军

学术指导委员会

王希隆	王肃元	王洲塔	王晓兴	王嘉毅
傅德印	伏俊琏	李朝东	陈晓龙	张先堂
郝树声	贾东海	高新才	董汉河	程金城

总主编：范鹏

副总主编：王福生 马廷旭

《陇上学人文存》第四辑

编辑委员会

名誉主任：	王三运	刘伟平
主任：	连辑	夏红民
副主任：	张建昌	范鹏 高志凌
委员：	管钰年	吉西平 王福生 陈双梅
	朱智文	安文华 刘进军 马廷旭
	张亚杰	李树军

学术指导委员会

王希隆	王肃元	王洲塔	王晓兴	王嘉毅
傅德印	伏俊琏	李朝东	陈晓龙	张先堂
郝树声	贾东海	高新才	董汉河	程金城

总主编：范鹏

副总主编：王福生 马廷旭

总序



陇者甘肃，历史悠久，文化醇厚。陇上学人，或生于斯长于斯的本地学者，或外来而其学术成就多产于甘肃者。学人是学术活动的主体，就《陇上学人文存》（以下简称《文存》）的选编范围而言，我们这里所说的学术主要指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存》精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甘肃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成就卓著的专家学者的代表性著作，每人辑为一卷，或标时代之识，或为学问之精，或开风气之先，或补学科之白，均编者以为足以存当代而传后世之作。《文存》力求以此从集荟萃的方式，全面立体地展示新中国为甘肃学术文化发展提供的良好环境和陇上学人不负新时代期望而为我国人文社会科学事业做出的新贡献，也力求呈现陇上学人所接续的先秦以来颇具地域特色的学根文脉。

陇原乃中华文明发祥地之一，人文学脉悠远隆盛，纯朴百姓崇文达理，文化氛围日渐浓厚，学术土壤积久而沃，在科学文化特别是人文学术领域的探索可远溯至伏羲时代，大地湾文化遗存、举世无双的甘肃彩陶、陇东早期周文化对农耕文明的贡献、秦先祖扫六合以统一中国，奠定了甘肃在中国文化史上始源性和奠基性的重要地位；汉唐盛世，甘肃作为中西交通的要道，内承中华主体文化熏陶，外接经中亚而来的异域文明，风云际会，相摩相荡，得天独厚而人才辈出，学术思想繁荣发达，为中华文明做出了重要贡献。

近代以来，甘肃相对于逐渐开放的东南沿海而言成为偏远之地，反而少受战乱影响，学术得以继续繁荣。抗日战争期间作为大



后方，接纳了不少内地著名学府和学者，使陇上学术空前活跃。新中国成立之后，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专家学者更是为国家民族的新生而欢欣鼓舞，全力投入到祖国新的学术事业之中，取得了一大批重要的研究成果，涌现出众多知名专家，在历史、文献、文学、民族、考古、美学、宗教等领域的研究均居全国前列，影响广泛而深远。新中国成立之后，人文社会科学几次对当代学术具有重大影响的争鸣，不仅都有甘肃学者的声音，而且在美学三大学派（客观派、主观派、关系派）、史学“五朵金花”（史学在新中国成立之后重点研究的历史分期、土地制度史、农民战争史等五个方面的重点问题）等领域，陇上学者成为十分引人注目的代表性人物。改革开放以来，甘肃学者更是如鱼得水，继承并发扬了关陇学人既注重学理求索又崇尚经世致用的优良传统，形成了甘肃学者新的风范。宋代西北学者张载有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此乃中华学人贯通古今、一脉相承的文化使命，其本质正是发源于陇原的《易》之生生不已的刚健精神，《文存》乃此一精神在现代陇上得到了大力弘扬与传承的最佳证明。

《文存》启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之际，在选择入编对象时，我们首先注重了两个代表性：一是代表性的学者，二是代表性的成果，欲以此构成一部个案式的甘肃当代学术史，亦以此传先贤学术命脉，为后进立治学标杆。此议为我甘肃省社会科学院首倡，随之得到政界主要领导、学界精英与社会各界广泛认同与政府大力支持，此宏愿因此而得以付诸实施。

为保证选编的权威性，编委会专门成立了由十几位省内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著名学者组成的专家指导委员会，并通过召开专题会议研讨、发放推荐表格和学术机构、个人举荐等多种方式确定入选者。为使读者对作者的学术成就、治学特色和重要贡献有比较准确和全面的了解，在出版社选配业务精良的责任编辑的同时，编委会为每一卷配备了一位学术编辑，负责选编并撰写前言。由于我院已经完成《甘肃省志·社会科学志》（古代至1990年卷，1990至

2000 年卷) 的编辑出版工作, 为《文存》的选编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和基本依据, 加之同行专家对这一时期甘肃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研究, 使《文存》能够比较充分地反映同期内甘肃人文社会科学的基本状况。

我们的愿望是坚持十年, 《文存》年出十卷, 到 201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之际达至百卷规模。若经努力此百卷终能完整问世, 则从 1949 至 2009 年六十年间陇上学人以“人一之、我十之, 人十之、我百之”的甘肃精神献身学术、追求真理的轨迹和脉络或可大体清晰。如此长卷宏图实为新中国六十年间甘肃人文社会科学全部成果的一个缩影, 亦为此期间甘肃人文社会科学学术业绩的一次全面检阅, 堪作后辈学者学习先贤的范本, 是陇上学人献给祖国母亲的一份厚礼。此一理想若能实现, 百卷巨著蔚为大观, 《文存》和它所承载的学术精神必可存于当代, 传之后世, 陇上学人和学术亦可因此而无愧于我们所处的伟大时代, 并有所报于生养我们的淳厚故土。

因我们眼界和学术水平的局限, 选编过程中必定会出现未曾意料的问题, 我们衷心期望读者能够及时教正, 以使《文存》的后续选编工作日臻完善。

是为序。

2009 年 12 月 26 日

编选前言

随着键盘的敲击声,吴小美教授的文集书稿即将编就。作为她的学生,我在学术和生活上均受到吴先生的恩惠,细读先生的文字,我深切地感受到,她的学术就是她是生命、她的人生。她用她独特的学术诠释了她不一样的人生旅程。这不是外在于生命之外的学术,她的学术生涯映照出她生活的全部。这是一部个人的学术史,它记录的是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生活史和心灵史,寂寞、孤独、痛苦、抗争,都在这里。先生独特的学术个性、情怀,均源出于她独特的气质、眼光。她的学术是书斋里的活动,但是,通过各个时期学术关注点的变化,我们可以聆听到我们民族国家时代变革的脚步声。总之,这是有“我”的学术,是有“我们”的学术。

多年后,我依然记得当初阅读英国艺术史家贡布里希的《理想与偶像》一书时,对书中提及的“学术工业”感到新奇甚至是惊讶。可是,今天人文学者却都已身处这一“工业”之中,不得不感叹全球资本扩展对人类生活的影响之巨。时代车轮滚滚向前,渺小之个体是无力、无奈的,可是面对这一巨变所带来的种种“进步”,我们有理由对其间人文学术传统式微表现出一丝伤感,我们希望包括现当代文学在内的人文学术能够在前行的路上永不失其激动人心的“属人”品格。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包括吴小美先生在内的老一代现代文学研究者的学术风尚值得认真反思、总结,以使由他们所构建起来的精神传统得以延续,避免“学术工业”时代人文学术精神贫血症的发生。



2007年,吴先生在为弟子所出的书写的序中说:“我们与学术对象之间的关系绝不是‘我’与‘它’的关系,而是‘我’与‘你’的关系,是一种超越现实时空的另一种‘交往’。”这可视为吴先生一生学术研究的自况,即她总是把人生与学术打成一片,在她那里,学术并不是外在于人生之外的事业,而其本身就是自我与学术的对话、人生体验的抒发,就是人生本身!其富有魅力的学术个性正是这种人生践履的精神外化!

1954年,吴小美先生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以“全优”毕业生的荣誉称号被分配到兰州大学中文系任教。正是在遥远的西部,吴先生开启了他的人生新起点,其学术原点也在那里发生、建构。50年代,青年时代的吴先生曾为诸多莫须有的罪名而困惑,但是倔强的个性使她并没有沉浸在苦闷中,在紧接下来的“大跃进”和“三面红旗”时期,白天他和其他老师一起大写红色诗歌,晚上则时常通宵达旦地写论文。当时选择了《青春之歌》、《红旗谱》、《创业史》等一批红色小说作为研究对象,可喜的是,三篇文章都获发表,有两篇居然登上了《光明日报》!这令他成为兰大青年教师中的“异类”,江隆基校长的嘉许更令她成为“众矢之的”,灾难接踵而至,游街、批斗尝遍,“漏网右派”、“修正主义黑苗子”、“江隆基的孝子贤孙”,各种名目的帽子戴在这个三十出头的女子头上。这一痛苦的人生经历成为吴先生一生的人生财富,成为她独特学术之路的所由生发点。

60年代前期,吴小美先生就已陆续写成了17万字的鲁迅研究专集《虚室集》(青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文革却使这部书稿连同有关的讲稿、资料、卡片、书籍被洗劫一空。据先生自己自述,这一遭遇为她积累了丰富的精神资源,甚至对其一生的研究内容、方法、思路都有深刻影响。“文革”结束后,吴先生环顾“虚室”,只能是如鱼饮水,冷暖自知。此时,《庄子·人间世》中孔子的一句话萦绕于心头:“虚室

生白,吉祥止止”。“室”既是四壁萧条的“室”,但何尝不可包容一个能生光发亮的宁静空明(“虚”)的心境(“室”)呢?吉祥善福可以被人劫去,不也可以由自己夺回吗?由此,她将第一部最珍爱的鲁迅研究专集定名为“虚室集”。当然,这重整旗鼓的决心和信心,离不开授业师王瑶先生的教诲和鼓励,她说:“人生多坎坷,要尽快忘掉过去,面对现在和未来。”此书即由王瑶先生作序,并得到高度认可:“用鲁迅精神研究鲁迅”,“从一个特定的角度映照出像作者这样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坚韧和追求。这里既充满了心酸,更表现了一种刚毅不屈的力量,它所显示的正是鲁迅精神的光芒。”吴先生选择了当时鲁迅研究领域中比较薄弱、分歧意见较多的两个中心课题,一是杂文,二是《野草》,以新的研究方法,提出新的分析角度。例如把鲁迅杂文概括为“一部旧中国的特别的‘人史’”;明确提出“对奴性和奴才传统的批判”是鲁迅杂文改造国民性思想的“一个重要方向”;又以专章论述了鲁迅前期杂文对封建专制主义和蒙昧主义的批判,并联系“现代专制主义和蒙昧主义”之复活去重温鲁迅这部分杂文,并开掘它们“至今十分新鲜”、催人猛醒、发人深思之处。这里有着一代学人经历“文革”后的历史反思,是当代与历史的精神对话,相关篇章在《光明日报》摘要刊登。

1980年,吴先生开始了对浓缩了鲁迅人生哲学的《野草》的全面诠释,其长文《论〈野草〉》曾作为全国优秀论文入选《鲁迅诞辰一百周年研究论文集》,得到业内人士的一致好评。认为,这部展示作者心灵历程及人生哲学而又曲折地体现时代社会矛盾的作品,不应离开其中的形象特征本身以庸俗社会学的观点方法“考证”某形象某事物的指代;对其中的一些抒情散文,更应从形象和文本出发,调动研究者的全心灵去融解、捕捉和联想。吴先生的《野草》研究与北京大学的孙玉石教授的《〈野草〉探源》是新时期伊始《野草》研究的重要收获。她



从比较文学角度进一步开掘其深层意蕴的系列论文《〈野草〉与〈爱之路〉——鲁迅与屠格涅夫散文诗的比较研究》^①、《“北京的苦闷”与“巴黎的忧郁”——鲁迅与波特莱尔散文诗的比较研究》^②、《人的期待与探寻梦的失落与执着——鲁迅与夏目漱石散文诗的比较研究》^③在《文学评论》发表。其中鲁迅与波特莱尔散文诗比较研究一篇被英译发表在美国某学术杂志，该文采用再现生活与表现自我之统一这一切入点，将《野草》中种种彷徨、犹疑、赤诚、焦灼的心灵色彩归纳为“北京的苦闷”，与波特莱尔的“巴黎的忧郁”对照比较，并在艺术观照中划清了浪子的忧郁和战士的苦闷的界限，突出了鲁迅的苦闷中内含的进取和干预的精神。这种比较研究，十分注意被比较的双方在同样独立的地位上各自伟大的创造。

《鲁迅与东西方文化》(兰州大学出版社 1999 年)一书，倾注了吴先生艰苦跋涉的汗水与心血。在《虚室集》基础上，她对鲁迅研究路向进行了认真的思考，希望赋予“鲁迅世界”一些新的价值形态和个性面貌，在《开创鲁迅世界诠释与研究的新局面》^④一文中，吴先生提到：对鲁迅作为 20 世纪中国的重要文化现象的认识，不能仅仅从阶级对立、政治对立、文化对立单层面去理解，必须从传统到现代、从西方到东方的联结纽带意义上去认识。这一超越单一意识形态的认识视野和框架，突破了已有的研究范式，真正“属人”的学术带来了研究对象无尽的阐释空间，鲁迅不只存在于一个封闭的历史狭笼，而是存在于当下。

该著作选定鲁迅与东西方文化、鲁迅的生死观、小说和散文诗的

①《虚室集》，青海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第 82 页。

②《文学评论》，1986 年第 5 期。

③《文学评论》，1991 年第 6 期。

④《鲁迅研究月刊》，1994 年第 3 期。

深入开掘、个性气质和乡恋情结四个方面进行研究。对鲁迅与东西方文化关系的基本特征，不仅表现在其与现代中国政治解放的紧密联系上，更重要的还表现在其政治意识向文化意识的自觉转换上。强调20世纪中国文化进化的一般特征和学界对此认识的一般方法论特征应该是我们的出发点，而鲁迅接受融化传播两潮的特征是多层面的，文化人格是鲁迅基本的人格属性。这项研究的原创性在于从更深的层次上开掘了鲁迅对救国道路的整体性思考与局部性思考的奋力，即在文化资源意识、文化开发意识、文化融合意识、民族深层文化心理结构意识上对中国社会的整体性把握和认识，反映着鲁迅与东西方文化关系的独特内容与格局，还具体透析了鲁迅与东西方文化广泛联系的斑斓景观。对鲁迅的生死观，吴先生首先观照的是其社会时代内涵，亦即其浓重的时代悲剧色彩，并以“血的代价”来概括，认为鲁迅是在对个体生死的形而上体验和对残酷现实的热切干预的相互关联中，在由死观生、由生观死的全方位审视中，其独特鲜活的人格显示出强烈的时代色彩。其次，鲁迅生死观的个性色彩是反抗死亡，将自我的生死和民族的拯救、人类的未来联系起来，显示出“盗火者”的牺牲与拯救的情怀。最后，对鲁迅晚年生死观的迟暮与辉煌，以及其中智慧性的恬淡、达观、平静，以及他实实在在地面对死亡的阴郁和颓唐，生的艰辛和死的超脱的交织，更为强烈的复仇情绪的充溢，很能证明死亡在鲁迅这里不是终结，而是新生。该系列论文，是在开掘着古今中外众多真正的思想家文学家生死观的共同规律。

吴先生在招收现当代文学专业研究生的同时，又开辟了文化传播研究方向，以传播学视角，写出《从“未庄——鲁镇文化”看中国传统文化的隔绝性和承传性》^①等论文；鲁迅散文诗研究方面，以美术切

^①《甘肃社会科学》，1994年第5期。



入写出《〈野草〉“可怖性”特征的探讨》^①，提出《野草》中因绝望和阴郁所产生的“可怖性”激情，不应只从消极的一面去诠释。文中将米开朗琪罗的雕塑《摩西》与《野草》中的《复仇》等篇章在精神特征上的近似进行比较研究，从中生发出《野草》中对死亡的夸张的“可怖性”，为鲁迅研究打开了新的扇面。从研究中国文人灵魂底色为出发点，吴先生从审美和文化两个层面研究鲁迅“乡恋”的两极，写下《论鲁迅的乡恋情结》^②，目标在于关注众多研究者乐道的鲁迅刚毅冷峻的“另一面”情怀，也是对传统原型的万般复杂的情感的全新诠释。《鲁迅个性气质论》^③则细析了鲁迅抑郁的个性气质，对其创作中的抒情音响、“自叙传”式的“我”的形象的塑造、乃至于《野草》式的创作倾向，在怎样地对他审美地把握生活和再现生活时产生的重大影响，以及这影响的痛苦性、延续性、长期性等均进行了考察。此外，《鲁迅与东西方文化》一书中对鲁迅写变态心理的审美情绪机制的研究等，吴先生也都尽力做到超越前人、超越自己。在专注于鲁迅研究的同时，吴先生还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等杂志发表过有关柔石、胡也频研究的创新性论文。

关注人、思考人，进而关注社会，思考社会，是吴先生一生的志趣所在，这一志趣主要经由现代作家研究尤其是鲁迅研究和老舍研究来实现。除鲁迅之外，老舍是吴先生所着力关注的另一研究范畴，并自觉地与研究范畴展开心灵对话，而不仅只是将之视为外在于自我之外的客观对象。吴先生曾长期担任中国老舍研究会会长，其老舍研究情结的形成与持续，无疑是和这位作家自身的悲剧情结以及他的

①《鲁迅研究月刊》，2001年第9期。

②《文学评论》，1994年第3期。

③《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5年第2期。